

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消极心态： 批判与匡正

王爱菊^{1,2}

(1. 安庆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南京 210097)

摘要:大学去行政化不仅是制度的变革,也是文化的重塑,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权力重组,也是道德层面的人心洗礼,不仅是外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内在人格的自我修炼。对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教师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责任相关者,既不能置身事外,也并非无所作为,应自觉以自我的去行政化推动大学去行政化。倘若大学教师保持对世俗功利的适当距离,葆有对学术的真诚与执着,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大学最深层次和最根本意义上的去行政化。

关键词: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教师;消极心态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2-0102-06

所谓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行政化”,也就是消解大学治理的过度行政化现象和趋势,在外部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倡导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在内部则改变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现状,划定行政权力的边界。无论哪一方面的去行政化,都旨在尊重或者遵循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机构的特质。而遵循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机构的特质,就是要让在大学里专门从事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人,即广大的大学教师,能够心无旁骛且有尊严地专心治学,安心从教。由此可见,大学教师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受益者,从根本上来说,去行政化有利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既然大学教师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受益者,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应该也同时是大学去行政化积极的拥护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对于与自身利害攸关的大学内

部的去行政化。然而,根据我们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和了解,大多数大学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拥护和推动的姿态,相反,处于一种集体性失语甚至集体性冷漠的状态。对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教师到底抱有怎样的心态?为何如此?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 大学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消极心态

心态既非神秘的先验存在,也非偶然的直觉冲动,虽然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状态,但并非不可捉摸。人们总是在面对具体事物的过程中表现或流露出自身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从而其内在的心态就从心理层面进入社会层面,成为可观察、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说,心态包括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两个维度。

对“大学去行政化”的价值评价包括认同、无所谓和反对三种,行为倾向则分为积极作为、消极不作

收稿日期:2014-10-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皖江流域乡村民俗的现代教育价值研究”(AHSK11-12D190)。

作者简介:王爱菊(1978—),女,安徽潜山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为和消极作为三种。消极作为是指抗拒、阻碍的消极行为倾向。将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两个维度加以组合,就可以得出大学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各种心态,其中既有积极心态,也有消极心态。譬如价值评价上的认同和行为倾向上的积极行为就属于典型的积极心态。本文着重于消极心态方面的考察和分析。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两方面的否定或不一致就是消极心态,包括四种具体类型,如表1所示。

表1.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消极心态类型

类型		“顺风车”心态	“看客”心态	“鸵鸟”心态	“犬儒”心态
特征	价值评价	认同	无所谓	反对	反对
	行为倾向	消极不作为	消极不作为	消极不作为	消极作为

所谓“顺风车”心态,就是在观念和价值上认同大学去行政化,但在行为倾向上既不积极作为也不消极对抗,只是坐等去行政化目标的实现,只想搭上历史进步的顺风车,享受进步成果。持有这一心态的人,通常将去行政化看成政府或大学管理者的责任,或者认为与自己无关,或者认为自己作为普通教师力量太微弱,所以不准备为实现大学去行政化做出任何实质性努力,也不认为有付出努力的必要,只是坐等而已。

持有“看客”心态的教师,把自己当成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在行为倾向上不作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仿佛一个夏夜里的纳凉者,只是在别人提起话题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评说几句,仅此而已。至于大学为何要去行政化、如何去行政化以及自己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通常不会去思考,也不认为有思考的必要。

遇到危险时,鸵鸟会把头埋入沙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对于大学去行政化,也有一些教师将其视为可能的危险,便如鸵鸟一般,装作不知道也看不见,好像一切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看来,去行政化意在打破甚至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势必会令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不快而遭到抵抗和阻挠。作为无权者的普通教师,如果搅入所谓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很可能招致打击报复。为了规避可能的危险,进行自我保全,他们视大学去行政化如洪水猛兽,在价值评价上持反对意见,行为倾向上则表现为保守、退缩、逃避、不作为。

所谓“犬儒”心态,乃取“犬儒”之今义而非古

义,指一种讥消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态,其根本特点是价值虚无主义和极端怀疑主义。“犬儒”心态者大多曾经是理想主义者,因理想屡遭挫折,便彻底放弃理想,甚至嘲笑理想,自认为看透一切,对世界严重地不信任和拒绝,却又不敢或不愿正面与之对抗,便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曲折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立场^[1]。持这一心态者,像反对一切那样反对大学去行政化,像嘲笑一切那样嘲笑大学去行政化,认为其纯属当权者的游戏,犹如“画饼”,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除此之外,他们还对那些试图为去行政化做出积极努力的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成为大学去行政化的消极阻抗力量。

以上从两个维度出发所分析出的四种消极心态,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而在思想中进行的逻辑上的分类和切割,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纯粹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逻辑的产物。逻辑分析如果缺失经验基础,无异于书斋里的玄谈或文字的游戏。就笔者作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的观察、经历、感受以及相应讨论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些类型的消极心态应当说是存在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对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前景和大学教师在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作用的双重不信任,因不信任而消极悲观,其区别只在于消极悲观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二 大学教师消极心态的分析批判

以上对大学教师诸种消极心态的归纳和列举,很可能招致很多教师的不满甚至反对。他们可能会反驳说,去行政化是好事,是广大教师梦寐以求的,怎么会有消极心态。这就涉及对去行政化的理解问题。去行政化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既是结果也是过程,两者是内在连续和统一的,没有作为手段和过程的去行政化,就不会产生去行政化这一目标和结果。上述诸种消极心态与教师对去行政化的梦寐以求并不矛盾,因为前者强调的是过程和手段,而后者关注的是结果和目标。我们并不否认教师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美好愿望。实现去行政化,划定行政权力的边界,重塑学术的地位和尊严,无疑对广大教师有利,恐怕不会有教师不希望去行政化。但是,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确定的信心,对于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当多的教师持悲观和消极态度,并不认为大学能够切实、真正地实施去行政化。美好的愿望更不等于坚定的信念和信念支持下的积极作为,在他们看来,

普通教师作为无权者,对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完全无能为力。

因而,实际上很多教师的心态既是消极的,也是矛盾的,在内心深处渴望大学去行政化,同时又不相信大学自身可以实现去行政化,更不认为自己能够在推动去行政化上发挥什么作用。那么,一线渺茫的希望系于何处?当然是外力强推改革,也就是政府介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力推动大学去行政化。笔者曾就去行政化问题与一些教师进行非正式访谈,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毫不犹豫地表示“除非政府真正下决心,否则根本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顺风车”心态是最为普遍的心态,也是所有消极心态当中或多或少具有的成分。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力推动大学制度变迁,就能顺利实现大学去行政化,令大学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吗?稍具历史知识和经验常识的人,恐怕都不会做出决然肯定的回答。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可以随意发明或制造出来并直接运用的,不管制度发明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也不管其智慧运思多么高明。倘若有人竭力为之,其结果恐怕只能是劳而无功,甚至南辕北辙。因为制度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悬浮于土壤之上而非植根于土壤之中的制度是无法真正发挥其规约和影响作用的。“拿破仑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的。其实,国家制度不是单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作品,它是理念,是理性东西的意识,只要这一意识已在某一民族中获得了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拿破仑所给予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得对它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头……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否则国家制度只能在外部存在着,而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2]₂₉₁₋₂₉₂。

在我国,大学之所以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比如大学是从国外移植的舶来品,欠缺思想积淀和大学传统;还有复杂的现实背景,比如教育资源分配的计划管理体制和党政二元的大学治理结构等;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那就是与行政权力对举的学术权力的主体——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复杂、暧昧心态。大学教师一方面,渴望学术的自由和尊严,

不满、反感甚至痛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宰制和操控;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影响,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加上行政权力所连接的现实利益的诱惑,又对行政权力怀有挥之不去的艳羡和崇拜之情。当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而垄断大学内的各种资源和利益时,大多选择了沉默、隐忍、顺从,甚至趋之若鹜地迎合、追逐行政权力,从而使大学的行政化在怨声载道中愈演愈烈。正如哈维尔所批评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3]₂₀。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单凭政府的决心和措施就可以令大学去行政化,既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也是对自我责任的遗忘和逃避。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只要行政文化的土壤没有动,官僚式的作风依然如故,人们对于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管理阶层的‘官员’想象和膜拜就仍会延续,教师和学生‘学而优则仕’的冲动就不可遏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仍会一切如旧”^[4]。

还有一点不要忘了,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和控制,尊重大学的相对独立性,逐步实现大学依法自主。希求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大学的去行政化,是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三 大学教师消极心态的匡正

大学行政化非一日造成,而是日积月累之功,不仅是组织和结构的行政化,也是大学文化的行政化。身处其中的人们,既是这一状况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一状况的造就者。毋庸讳言,上述种种持有消极心态的教师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行政权力,因为临渊羡鱼、求而不得,才转而伤心失望、灰心丧气,一边幻想着假“上帝之手”强力去行政化,同时又觉得积弊太深前景无望。因此,要令大学去行政化,不仅需

要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相应变革,也需要大学文化的更新与变迁,甚至可以说,后者更为根本,更加重要。没有大学文化的更新与变迁,就不会有大学的变化与重生。

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人修身立命的追求^[5]。因而,大学文化的变迁实质就是大学之内的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人修身立命的追求的变化。如此,大学去行政化就不能依赖“上帝之手”拨云见月,而只能通过生活方式的一点一滴的切实改变而渐进地达成。作为大学教师,必须自觉对自身所持有的诸如等待、观望、退缩、讥讽的种种消极心态进行检视、批判和匡正,努力以自我的改变谋求大学的改变,以自我去行政化推动大学去行政化。这是教师之应为与能为,是无权者的权力。

(一)深刻反思自我,重塑生活方式

选择一种职业,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人选择做一名大学教师,就应该以大学教师应有的姿态和方式去生活。否则,这个人或者是不称职的大学教师,或者是分裂的人。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而是指大学教师的生活共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内在特征。“大学教师”,哪怕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也可看出社会对其的期望和要求。“教师”意味着以教育为志业,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身在“大学”,则还需钻研高深知识,以增进真知。这两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教学和科研,教学是传播知识的学术,科研是探究知识的学术,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大学学术的基本内容和大学教师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大学教师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甚至可以说,大学教师就是为学术而存在的,教室或者书房、实验室应该是大学教师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然而,返观当下的大学教师群体,尽管他们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教室、书房或实验室,但身体的在场是否等于精神的同时在场呢?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人们毫不掩饰对金钱和权力崇拜的时代,一些大学教师亦不能免于功利和庸俗,身在学校却心在商场或官场,将金钱和权力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孜孜以求的不再是学术,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意识到大学场域里行政权力与各种利益的勾连关系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拜倒在行政权力面前,不顾尊严向行政权力献媚,千方百计跻身于行政队伍,竭尽

所能攫取行政权力,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和利益要求。在一些大学里,教师争相竞聘后勤、保卫部门的处长甚至科长的情况屡见不鲜,正是这一价值取向赤裸裸的体现。大学的行政化既是因,也是果,因果循环,愈演愈烈。因此,作为大学教师,倘若意识到这是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双重异化,倘若仍然对大学去行政化抱有一丝希望甚至幻想,就不能放任自己随波逐流,而应该深刻地反思自省,审视自己是否在其位而不谋其事,是否切实履行了一个大学教师应有的使命与责任,是否以大学教师应有之姿态立身于世。在此基础上,重塑生活方式,将学术作为生活的重心,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惟其如此,大学才能从扭曲回归本位,才能真正成为培养人才和追求真理之所,大学去行政化才能建立起最坚实、最重要的观念基础和生活根基。

(二)纯正学术动机,维护学术尊严

倘若大学教师以学术为基本的生活方式,却在内心深处只将学术当作晋升的阶梯,其意仍在获取控制和支配大学资源的行政权力,那么,即使所有的大学教师都为学术殚精竭虑,仍然不能有助于大学的去行政化。遗憾的是,这恐怕就是当下很多大学的现状。当下大学的行政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勾结,以及学术文化对行政文化的依附。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包括一些在各个学科领域做出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也并非如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而是以学术为跳板,通过学术成就换取行政权力,又利用行政权力攫取更多学术资源,再以学术强势巩固行政权力或谋求更大行政权力,从而达到控制学科乃至大学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动力来自对行政权力的渴求,一旦心愿达成,便一心“为官”,再也不从事任何实质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却左右和把持着本校甚至更大范围内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和学术荣誉的评价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学官”。每年各学科领域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科研项目 and 奖项,往往都是由这些“学官”及其依附者们瓜分。学术行政化与行政学术化的勾结和共谋,导致大学的学术空气日益稀薄而行政文化异常“繁荣”,大学成为追名逐利之场所。学术也就成了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工具和筹码,毫无神圣性可言,以致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韦伯指出:“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

学科当作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古人的话呢?’——这样一个人是不具备‘个性’的。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6]26-27} 当一个应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成为醉心于权力的功名利禄之徒,那么他的行径不仅败坏了自身的形象,也贬损了学术的尊严,褻渎了学者的人格,更加剧了大学的行政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独立的学术已经不存在了,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独立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就不可能与行政权力相抗衡,而只能依附于行政权力苟且偷生,或者狐假虎威。因而,大学要去行政化,大学教师必先纯正其学术动机,不仅靠学术而生存,更要为学术而生存,不攀附权力,而以学问立身。“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惟有找回失落的对学术的真诚与执着,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学术存在,惟有真正的、独立的学术存在才能树立学者的自信和自尊,从而才能有底气和力量抵制行政权力的僭越与凌驾,维护学术的地位和尊严。如此,所谓大学的行政化也就开始从内部自我瓦解了。

(三)保持独立人格,守护大学精神

无论我们认识到与否,我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自身^[7]。以学术为志业,服膺于内心所追求和企及的真理,并勇敢捍卫自己所坚持的真理,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便具有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性,即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乃是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即摆脱各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和控制,独立自主地思考、判断和行动的品质。独立人格既是标识知识分子之存在的鲜明印记,也是知识分子之所以备受景仰的根本原因。苏格拉底的魅力穿越千年,不只是来源于他犹如神启的智慧和卓越不凡的口才,也不是他为了进行自我改良而进行的纯粹的内心斗争,更多的来自于他那牛虻式的卓然而立、勇敢批判的风骨,以及堪称典范的生与死的公开的英雄主义行为。爱因斯坦的声望超越科学世界,不仅是因为他那几乎无人可以比肩的绝世才华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始终如一的面对任何困难、危险或者利益、诱惑都不能

改其志的对真理的坚持、对和平的热爱、对非正义的谴责以及对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同样,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朱自清到底在学术上做出了哪些贡献,但对于他宁死不吃救济粮、不屈于侵略者的民族气节却印象深刻、感佩于心。拥有独立人格就拥有了内心的自由,从而不会被外在虚名或物欲所蒙蔽,同时也就拥有了内心的强大,从而不会屈服于权势的压迫甚至生命的威胁。

在今天这个民主化不断推进而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社会里,做一名大学教师可能不会遭遇苏格拉底的危险、爱因斯坦的艰难或朱自清的困境,但我们仍然需要,甚至更加需要保持独立人格。因为各种诱惑依然存在,而且金钱和权势崇拜相比较而言更加普遍化、合理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内心的宁静和自由,就需要更多的修养、自制和勇气,从而独立人格也就成了更加珍贵和稀缺的品质。倘若大学教师能够保持独立人格,就不会听任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横加干涉、颐指气使,就不会容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勾结败坏大学风气,就不会宽纵大学日益堕落沦为名利场,就会自觉而勇敢地承担起守护大学精神和理想的时代使命。如此,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前景就不会悲观,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去行政化改革成功的一部分。

四 结语

当下大学的内外环境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但这不是可以降低自我道德要求和逃避个体责任的借口。每一位大学教师都应该意识到:我怎样,大学便是怎样。对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教师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责任相关者,既不能置身事外,也并非无所作为,而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倘若大学教师保持对世俗功利的适当距离,葆有对学术的真诚与执着,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最深层次和最根本意义上的去行政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政府的责任和制度变革的重要性,而旨在阐明政府介入和制度调整之于大学去行政化的有限性和不充分性。大学去行政化固然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需要制度的相应变革,但决然不仅是制度的变革,也是文化的重塑,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权力重组,也是道德层面的人心洗礼,不仅是外在的利益重新分配,也是内在的人格自我修炼。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滋养出更好的制度。

参考文献:

- [1]陶东风.谈犬儒主义[N].学习时报,2007-03-12(06).
-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HAVEL V,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M].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4]王建华.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1):23-32.
- [5]陆扬.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J].文艺争鸣,2010,(17):6-10.
- [6][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第2版.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7]徐继存.教育学术的尊严[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0-64.

A Criticism and Rectification of Teachers' Negative Mentality towards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WANG Ai-ju^{1,2}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2.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Pedag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 systematic reform,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outer profits, but also cultural remodeling, moral baptism and self-cultivation of private personality. Teachers, as stakeholders, have due responsibilities so that they could neither stay out nor attempt or accomplish nothing. They should use the self de-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the school. Once teachers keep themselves away from excessive earthly profits, pursue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and stick to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literati, the most in-depth and significant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teacher; negative mentality

[责任编辑:罗银科]